

探访无性婚姻介绍所

无性人群渴望家庭温暖

性生理和性心理方面的残疾或障碍,不仅得不到别人的同情,反而常常会遭到更多的讽刺和歧视。“无性群体”在建立家庭上的艰难和隐痛,也被人们长久地忽视。

“61年生,一米七四,带10岁女孩,事业单位,国家干部,年收入十万,家庭责任感强,不嗜烟酒,正直诚实。要求女性:40岁以下,漂亮肤白,性格温柔。无生育能力。”

这是长沙市一家“无性婚姻”介绍所中的一份登记资料。最后一句“无生育能力”是一种隐晦的表达。前来登记的征婚者对介绍所的负责人明确地说,自己因为治疗疾病用药而造成性功能丧失,希望找到一个可以接受无性婚姻的伴侣。

“无性婚姻”这个带有些古怪味道的词语,如今已经渐渐浮出水面。在这个征婚者背后有着一个沉默的群体。这些人因为生理或者心理,先天或后天的原因丧失性能力,他们中的绝大多数在城市的角落中孤独地生活着,但依然像大多

数人一样渴望家庭的温暖。

长沙市惟一一家“无性婚姻”介绍所,负责这个特殊婚介所的是一个看起来30多岁的男子,姓洪(化名)。这家介绍所尚未在任何部门注册,只是一种以私人信任为基础的中介行为。洪某也不以此为生,尽管此时他并没有其他工作。

洪某告诉李昌,自己实际上已经45岁,至今未婚,从挪威回国大约有两年。1996年前,洪某是长沙一家工厂的一名工人,在工厂倒闭前自愿退职,和朋友经营生意,赚到一些钱,就出国前往菲律宾。

2007年10月15日,洪某第一



次在当地媒体发布无性婚姻介绍所的广告。半个月后,一位女孩自己找上了门。

“那个女孩26岁,先天阴道闭塞,是先天的疾病。”洪某说。在洪

某的历中,这个女孩属于“胆子大”的。

敢于自己来这里登记,并留下联系方式的年轻女孩并不多见。登记之后,洪某又一次选择了在报纸上刊登广告的方式。他用两行文字大致介绍了女孩的情况,并说明无性婚姻的要求。刊登后的几天之内,就有40多个电话打到洪某的介绍所。那个女孩挑选了三个,分别见了面。“到现在已经找到合适的伴侣,没再来过。”洪某说。

到目前为止,来洪某的介绍所当面咨询或者电话咨询的人很多,但是真正登记交费的人比例不大。按照洪某的规定,来这里登记要留下个人描述、联系方式和征婚条件,并交纳200元费用。这些费用无论成功与否都不予退还。如果选择在报纸上登广告方

式,为了保护隐私,洪某就会留下自己办公室的电话。但这又需要会员另外交钱。

洪某还对李昌说,一些生理和心理有障碍的人会到他的介绍所找他倾诉。他也会给予开导和帮助,“我会每半小时收费50元。我不是专家,但是来的人很信任我。他们平时没有渠道诉说这些事情,说完之后他们走的时候感觉都很好。我以后可能会多做一些这方面的事情。”洪某说。

这两年间,就在上海、南京、长沙等地陆续出现专门的无性婚姻介绍所的同时,一家专门针对无性人群的交友网站也开始进入这个人群的视野。

在中国,选择“无性婚姻”的人群,基本上都是因为生理和心理的疾病或者障碍,是一种被动的选择。中国社科院的研究员王震宇说,“上世纪90年代,我在日本听说了‘无性婚姻’,但是和我国还不一样,我们更多的是因为疾病。因为这个领域太隐秘,我国几乎没有专家专门进行这方面的研究。”

在林海的无性婚姻网上,有一个“真情告白”的版块,里面有几千条留言和征友启事。它们几乎概括了绝大多数选择无性婚姻的原因:先天疾病,后天外伤或者药物致残,感情受到伤害而引起的心理障碍,女孩遭受过性暴力而对性产生恐惧,以及同性恋人群的形式婚姻。(志尉)



汽车突然竖立如“变形金刚”

6日上午近10时,广东惠州沿江公路江北路段往市区方向,一辆红色翻斗车行驶途中车身竖立起来,撞上了公路上近6米高的龙门

架。翻斗车车身翻转车头悬空,看起来就像影片《变形金刚》里的大黄蜂,路人戏称上演现实版“变形金刚”。

李更祥 摄

社会保险走向全国联网
异地转移实现老有所养

两会期间,就社会保险能否全国联网的问题,劳动保障部部长田成平指出:“我们要经过两年的努力,在各省市区实现养老保险的省级统筹,养老保险关系就可在省内实现社保卡的一卡通”。

田成平的表态与网友建言有异曲同工之处。

网友“邵明丽”:医疗和社保异地跨省转移政策,应该随着现今社会工作流动性增大而增加更大的灵活性。

网友“在外务工人员”:能不能把每个人的养老保险像身份证一样建立个人账户,全国通用,在哪个单位工作哪个单位就上缴养老保险金到这个账户。

网友“社保新思路”:国家能否为全体公民统一缴纳养老保险和医保等社保(资金可从各单位的利税中抽取),这样可以避免单位不缴或少缴职工社保以及“双轨制”、“等级制”等不平等待遇,没工作的人和打零工的人也不愁了。等公民到了退休年龄,凭身份证按照其养老时所在地方的物价水平发给相应的退休工资,并可在当地用全国通用的医保卡看病。

网友“howoh”:我想我国的社会保障系统是不是可以改成像银行那样,各省各地的社保基金都统一缴给类似人民银行那样的机构,退休人员的退休金由该机构统一分发,这样将不会出现职工跨地区转移时各地方政府从各自利益出发而产生的一系列问题。

网友“农村人”:城里人到了退休后每月都能拿到不少的退休金,农村人可能要干到他们干不动农活的那一天才能退休,可能是70岁,80岁。虽然有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可是每年要缴数目不小的费用,只靠地里的收入是很难缴得起的。希望能建立一种类似城市的退休制度,彻底解决农村老百姓的养老问题。农村人辛苦了一辈子,也想有一个衣食不愁的晚年。

(熊建群)

重庆近千万福彩奖金无人认领

“福彩寻人启事”,“全城搜索大奖得主”……每每有疑似大额弃奖发生时,总会在市内各大报纸媒体、福彩投注站看到大量的福彩寻人信息。信息发布后,有的中奖者来了,不过,更多的是石沉大海。去年,弃奖现象更是层出不穷。

最新数据显示,2007年,重庆福彩彩票总奖金达9953887元,其中,双色球彩票9286380元,占弃奖总金额的93.3%。另外,七乐彩彩票389094元、3D彩票223840元、20选5彩票54573元。

市福彩中心兑奖厅工作人员告诉记者,购买彩票都是不记名、不挂失的,福彩中心只能通

过技术查询到中奖站点和中奖彩票的投注方式,寻人启事犹如大海捞针,难度可想而知。我们只能尽力而为。

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去年,在重庆市双色球彩票中,5元的双色球未中奖弃奖最多,共718930注,金额达359万余元。按照去年双色球共开奖153期计算,平均每期重庆彩票就丢掉4573注双色球未奖。

专家指出,导致弃奖的原因有很多,遗失、遗忘,沾污在弃奖中占有很大比例。而相对于奖金数额较高的奖项,5元小奖的弃奖有所不同,其中有很大一部分是彩民见中奖金额太小,未去及时兑奖,而这在主观上是可以避免的。

(整军)

全国两会期间,人大代表章青和陈静怡建议,将幼儿园纳入义务教育管理,由政府财政为孩子的启蒙教育买单。记者了解到,成都目前已在试点。

大多数时候,从娃娃2岁半至3岁,家长就会考虑入托。记者走访了3间幼儿园发现,如果孩子全年在幼儿园日托,所需花费至少6000元。

龙南南街一家幼儿园办公室主任说,3岁以下的娃娃每年需要缴纳1000元管理费,白托费是460元/月,全托费是680元/月。照此推算,一个3岁以下的娃娃全年白托,需要6520元。这还不包括需要入学一次性交付的卧具费,其他的书本费等等。此外,幼儿园开办了外语、珠心算等兴趣班,这笔费用另算。

长寿路的一家私立幼儿园,大门外立着收费牌,管理费是3000元/年,250元/月的伙食费、30元杂费,白托价格为370元/月,一年的总费用为10800元。这个费用还不包括书本费、卧具费之类。

成都市教育局学前教育处处长吴丽娟说,她很认同人大代表

成都试点实行儿童上幼儿园免费政策

的建议,幼儿园纳入义务教育范畴,已在成都市新津试点。

吴丽娟说,在普九进行过程中,义务教育正在逐渐向高等教育和学前教育转移。就成都市而言,推进城乡一体化的同时,也在推进教育的均衡发展,成都市首

先考虑的,是将农村、乡镇中心幼儿园由政府来修建,办老百姓上得起的幼儿园。从整个国家教育的大范畴来看,为学前教育立法已纳入“十一五”规划中考虑,提上了议事日程。

猛追湾双语学校校长李艳认为,将幼儿教育纳入义务教育范畴,

对老百姓而言很好,但说易行难。义务教育就是政府买单;百姓受益,从普九的情况看,幼儿教育纳入义务教育的脚步声已越来越远。

李艳担心的问题是:政府是否有足够的实力和财力来支撑?目前,成都的普九只是免费到农村,城市尚未普及。幼儿教育纳入义务教育范畴,绝对是惠民工程。但在普九还未完全免费之前,实施起来难度很大。(吴楚雄 雷湘晓)

在相当长时期内
我国不具备废除死刑条件

3月7日上午,最高法院审委会副部级专职委员、刑事审判第一庭庭长黄尔梅做客新华网,在访谈中,黄尔梅表示,目前中国废除死刑还没有具备这个条件。我们国家现在的政策是保留死刑,严格控制死刑,在保留死刑的同时,我国始终致力于不断建立和完善保证死刑判决慎重和公正,保障严格控制死刑适用的相关制度。

黄尔梅认为根据我国刑法的规定,可以适用死刑的犯罪主要是侵犯公民人身权利的故意杀人、抢劫杀人、绑架杀人、强奸杀人等严重暴力犯罪,严重的毒品犯罪等严重危害社会治安的犯罪。此外,我国刑法对极少数特别严重的走私、贪污、受贿等经济犯罪和职务犯罪也保留了死刑。现阶段对这些犯罪规定有死刑,主要是考虑到:首先,我国现阶段正处在发展时期,是刑事犯罪高发期,严重暴力犯罪、经济犯罪和职务犯罪居高不下。这些犯罪对公民以及社会造成极其严重的危害。如暴力犯罪剥夺了公民的生命,严重经济犯罪和职务犯罪危害了国家经济秩序,严重地破坏了国家工作人员的职务廉洁和公信力。其次,虽然近年来我国司法界、理论界以及其他社会各界关于死刑制度的思想观念和认识不断发展变化,但我国死刑制度已有4000多年历史,死刑已深深地植根于国民的意识中,民意调查表明,各界仍普遍赞成上述犯罪使用死刑。90%的公众要求对罪行及其严重的经济犯罪和非暴力犯罪适用死刑。再次,对于这些犯罪,死刑具有最大威慑力,并且最有利于预防犯罪的发生。最后世界上有一半以上的国家还保留了死刑制度,这反映出对于死刑的存在问题,无论是在理论上,还是在国家政策层面,都存在较大争议,各国应当根据国情做出选择。当前,学术界及其他一些社会人士已经在讨论我国是否应当以及何时废除死刑的问题,但主流的观念仍然认为,中国目前尚不具备废除死刑的现实条件。黄尔梅提出,在这一问题上,我们的基本立场是,与其他问题一样,对于死刑制度,我们也从不拒绝改革,关键是要符合中国国情,要真正起到促进保障人权作用。(政法)

“提高企业职工工资水平,建立企业职工工资正常增长和支付保障机制。推动企业建立工资集体协商制度……”听到温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谈到收入分配改革的思路时,全国政协委员、全国总工会副主席陈鸣起很振奋,“这是工资集体协商机制第一次写入政府工作报告!”

劳动保障部副部长张小建前天在列席工商联界别联席会议后表示,由劳动保障部牵头

是先由人大制定相关法律,为了将其具体化,需要国务院出台条例法规。另一种是先由国务院制定相关条例,推行政策的实践,等时机成熟再进行立法。《工资条例》和工资法的关系便属于后者。

对于总理政府工作报告中首次提到的“工资集体协商机制”,张小建表示,工资集体协商是发达市场经济国家的通行做法。我国将借鉴外国经验,并将其写入

工资条例草案主体完成
集体协商将成为工资增长机制

制定的《工资条例》草案主体已完成,我国将把工资集体协商机制的政策通过法律化确定下来。

据张小建介绍,目前《工资条例》草案主体已经完成,正在按照相关法律法规征求各方意见。“作为国务院制定的条例,《工资条例》属于法律体系中第二个层面,即国务院法规。”

当被问及《工资条例》和工资法的关系时,张小建说,我国制定法律一般有两种情况,一种

《工资条例》,“我国将稳步落实工资集体协商政策,并将工资集体协商逐步法律化,职工工资水平的形成和增长将由企业和工会双方谈判确定。”张小建说,由于我国企业所有制的多元化,工资集体协商需要逐步推进。

近日有媒体称,五年内工资集体协商将覆盖所有企业。对此,张小建并未明确表态。但他表示,劳动保障部门、工会部门已经在全社会推进工资集体协

商。“全社会推广并不是指每一个企业都要单独进行集体协商。”张小建说,在工资集体协商发展到一定程度后,就会建立区域性的、行业性的工资集体协商制度。由地域性的、行业性的工会和商会进行协商,确定工资水平。

国家发改委宏观经济研究院经济所副所长杨宜勇研究员认为,工资集体协商是我国收入分配改革的一个方向。由于我国目

前劳动力市场阶段性供大于求,很多企业压低一线职工的工资。而在市场经济下,政府不可能再像计划经济时代,在微观层面规定企业的工资,只能通过政策进行宏观调控。因此,解决一线员工工资长期得不到增长的问题,除了政府出台政策保障外,现在还需要企业职工改变过去的观念,通过工会主动和企业进行谈判协商,运用工会为自己伸张合法权益。(好望)

富县204人违规进机关吃皇粮

200多人违规进陕西富县各级党政机关单位工作,该县多名官员被涉及此事后,仅受处分,再被调离。

2005年前后,富县共有300余人通过关系进入乡镇政府机关工作。3月5日,记者从富县人事和劳动保障局一位工作人员处获悉,富县确实发生了大规模向乡镇政府机关违规进人事件,目前,经有关部门查出确认的违规进人数为204人。此后,这些人进入乡镇政府机关。

富县人事局有关工作人员仅表示,去年,上级纪委对违规人员进行清查,“第一批清退了109人”。

3月5日,富县一位干部表示,“这个事情(违规进人一事)主要是人事局和财政局私下弄的,人事局安排进来,财政局同意发工资就行了。对于人事局局长,降级处理,调到科技局局长当局长了,财政局局长原先是县委常委,党纪处分分都有,然后调到另外一个县当专职常委。”这位受纪人表示,原财政局长是副县级,属于市管干部,处理是由延安市委做出,“对于县人事局人才经办中心两个负责人,县上做了记大过处分。”

“违规进去那么多人,吃了财政多少钱?”3月6日上午,富县居民表示不解。还有不少人指责,对涉事官员的处理太轻。

延安市纪委办公室一工作人员表示,对案件不是特别清楚,是否仍在查处中也不知情。(清溪)

人大代表建议修改刑法
严惩包二奶行为

随着社会的发展,“包二奶”现象可谓屡见不鲜,“重婚纳妾”甚至成为某些“成功男人”到处炫耀的谈资。近日,全国人大代表周红玲提交了专门议案,建议对“包二奶”现象进行更明确的定义并加以严惩。

周红玲介绍,《刑法》第258条规定重婚罪是指有配偶者在婚姻登记机关再次与他人登记结婚的行为。最高人民法院1994年12月司法解释“有配偶的人与他人以夫妻名义同居生活的,或者明知他人有配偶而与之以夫妻名义同居生活的,仍应按重婚罪定罪处罚”。但周红玲认为,客观现实是,重婚者几乎没有再次办理登记手续;

同居时,对外也不会以夫妻名义相称。这种有稳定同居关系的行为没能纳入法律界定的重婚范畴,实际生活中重婚者被依法追究刑事责任的很少。

她建议将原《刑法》第258条修改为:“有配偶者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与他人有固定住所同居关系,或明知他人有配偶而与之在固定住所长期共同生活,除以下情形外,处二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拘役:1、被拐骗的妇女;2、因自然灾害生活难以维持,被迫外流,为谋生而与他人重婚的;3、因配偶长期外出,生死下落不明,家庭生活发生严重困难而重婚的。”(中廷宾 吴飞)

制定五部新法反腐败
中纪委原副书记刘锡荣建议

5岁娃娃为什么能当公务员?
一个县为什么胆敢配17个副县长?

现在,我们国家一些钱没有列入财政预算,就是列入了,有的也不严格执行。

许多省、市甚至县都在北京设立各类办事处,为什么“跑部钱进”的这么多?就是因为一些部委自由裁量,自由分配各种财力的权力太大了,想给谁就给谁,想给多少就给多少,所以“不跑白不跑”。

一些部门想法设法给自己扩权,然后通过手中的权力,一挖国家的,二拿老百姓的。

小金库现象之所以屡禁不止,与我们国家没有设立惩处集体贪污法有关。

一些腐败官员钻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的空子,死不开口,以逃避法律的制裁。

我们不仅要廉洁的公务员,还要建设廉价的政府。

中纪委原副书记刘锡荣代表在发言中建议,制定五部新法反腐败。

第一部是国民收入分配法。现在,我们国家每年有5万亿的财政收入,蛋糕做大了,如何分配好这个蛋糕,这里头大有文章。建议尽快制定国民收入分配法,让每个纳税人、每个公民都有权利来过问国家的分配状况。

第二部是财政预算法。这样就出现了腐败现象。所以,要制定财政预算法改变这一现象,把每笔钱开支都列入财政预算。

第三部是惩处集体贪污法。目前,我们的财政体制是分级分灶吃饭,这种体制有好处,能调动地方增加财政收入的积极性,但

也容易滋生腐败现象。一些省份,好的厅与差的厅公务员收入相差七八倍,甚至几十倍。一些厅的收入这么好,与这些厅有小金库有关。为了做大“小金库”,一些部门“三乱”收费屡禁不止;一些部门把审批权改为审查权,把审批权改为备案权,巧立名目,就是不放手。然后通过手中的权力,一挖国家的,二拿老百姓的。选举时,发钱多福利好的单位领导往往比老老实实的厅长得票高。小金库现象之所以屡禁不止,与我们国家没有设立惩处集体贪污法有关,出了问题,集体挑担子。如果还不设立惩处集体贪污法,去年的工资改革可能要“回潮”。公务员分配法制化应是我国依法行政、依法治国的重要标志。

第四部是公务员财产申报法。目前,国家法律规定,巨额财产来源不明,最高判刑5年。一些腐败官员巨额财产来源不明,就钻法律的空子,死不开口,以逃避法律的制裁。而在一些国家,公务员如果巨额财产来源不明,一旦发现,视同贪污受贿惩处。

第五部是行政机编制法。我们不仅要廉洁的公务员,还要建设廉价的政府。解放初期,大的县机关也就一百多名干部,而现在,一些乡镇机关的干部竟多达四五百人,既增加了人民负担,也增加了教育、管理、监督成本。刘锡荣说自己任中纪委副书记时,负责联系西部省份,某省一官员在担任人事厅长时,把15个亲戚“农转非”安排到机关当公务员,所以,急需制定行政机编制法,一旦确定职数,一个都不能超。(陈东升)